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〇五期 ——
(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9b)

【史海钩沉】“九一三”事件的最新披露 朱 仁·程 瑾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二十二) 周孜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九一三”事件的最新披露

• 朱 仁·程 瑾 •

1971年9月13日凌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乘坐一架三叉戟飞机外逃，途经蒙古上空，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摔死。

林彪是当时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推动者和受益者。被称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也是中国共产党“九大”党章中所明确的“接班人”。他的外逃令全国乃至全世界为之震惊。同时，林彪叛国，暴露出军队高层一些人与其相关连的阴谋。解放军各军种、各部门的一批高级军官陆续受到审查。这是新中国和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大案，这一事件的发生迄今警世至深。

1. 林彪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夺权运动，要“大闹”，“大升一批，大罢一批” / “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

一位对林彪生平作过深入研究的作家曾说：“在林彪一生里，他唯一缺少的就是对权力欲的控制力和意志。”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同时改组了中央政治局，林彪排名提前，仅次于毛泽东，位居第二。会议没有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但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便不再提及，林彪实际上成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并被称为全党全军全国的副统帅，事实上取代了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是，林彪对这种显赫的地位没有满足，他冀望的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一向深居简出的林彪显得异常活跃，频频出席集会，发表讲话。林彪的讲话用语尖锐，思想极端，极富煽动性和震撼力。他宣扬文化革命是一场夺权运动，提出要“大闹”，“大升一批，大罢一批”。1967年初，在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林彪又说：“对老干部有的烧，有的保，有的放火，有的灭火”。对什么人烧、什么人保，林彪有他的原则，那就是异己者烧，投靠者保。

“文化大革命”造成国家秩序的混乱，林彪却乘机组成了自己的政治集团。依靠军事起家的林彪历来十分重视军权，他称军权为“权中之权”。一次，林彪同黄永胜谈话，讲到军队的作用时，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林彪悟得此道，更兼数十年从军之便，因而着力自军中网罗追随者。

1967年1月，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总后机关受到群众批斗。邱的妻子胡敏多次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报告邱会作挨斗的情况，请求“救他一命”。1月24日，邱会作给林彪、叶群写信求救，表示：“今后如同过去一样，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这是一封写给林彪的效忠信，“跟着毛主席走”，不过是个幌子，跟林副主席走才是真。林彪读信后即和陈伯达共同签署一纸命令，派叶群去总后，把邱会作保了出来。为此，邱会作写了一篇日记，表达自己感激涕零之情。此后，邱会作成为林彪集团的忠实成员。

林彪用类似的方式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逐一收归帐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吴法宪和李作鹏仰仗林彪的扶持，分别掌管了空军和海军。“文革”中，二人都曾受到林彪的庇护，他们惟林彪之命是从。李作鹏发誓说：“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后来，吴法宪也承认说：“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1968年3月，林彪捏造了子虚乌有的“杨、余、傅事件”，骗取毛泽东同意，打倒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进一步掌握了军权。他提拔自己的“嫡系”干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

随后，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从4月起，聂荣臻等几位原任军委副主席被停发应发给他们阅批的文件，实际上不再参与军委工作。不久，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军队的指挥权已经转移到林彪及其追随者手中。“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处于受冲击地位的黄永胜受到林彪庇护又飞黄腾达，他感恩图报，发誓：“在任何时候都要忠于林副主席”。

这些效忠的人被林彪列入“大升一批”之中，他们不仅拥有了军权，政治上也获得擢升。当众多开国元勋纷纷卷入政治漩涡而黯然失色时，他们开始光彩夺目地出现在中国的权力核心。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林彪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惟一的副主席，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同跨入中央政治局。林彪集团仍然把持着军委办事

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林彪确认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的陈伯达也开始倒向林彪一边。

林彪集团进入了鼎盛时期。可是，林彪本人的地位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依然屈居第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觉到现时的地位也存在被取而代之的危机。

2. 林彪准备提前接班 / “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的态度与毛泽东相左 / 林彪私下说：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林彪集团比肩而起的是文化革命中另一派受益者——江青集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主要人物也进入了政治局。林彪一伙分析形势认为，“九大”以后，国家局势基本稳定，和平时文人方面的工作和力量势必要发展。而毛泽东也似乎有意扶持江青集团，与林彪方面抗衡。1970年，林彪愈加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势力的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便图谋提前“接班”。

1970年3月，毛泽东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同时提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再设国家主席职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成立了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

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東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所指“无用”的东西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语言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看来是必需的个人崇拜的东西现在显得过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应该降温了。

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林彪很快就见到了。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批示没有作任何表态。

一个星期后，林彪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对毛泽东改变国家体制的建议明确提出反对。他表示：应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林彪还特别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建议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意见理所当然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赞同，周恩来对此也没有异议。对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来说，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个形式问题；因为无论毛泽东是否担任国家主席，他的最高权威地位都是无可置疑、不可动摇的。当然，事情最终需要毛泽东本人决定。上报毛泽东后，毛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也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他认为国家主席形式上的事务太多，被杂

事缠扰不利于集中精力研究要紧的事。当年，他辞去国家主席就有这方面的考虑。现在，毛泽东年事已高，更不愿再任国家主席一职。如果他不当国家主席，那么由谁来干呢？毛泽东曾考虑由董必武来当，但这时董必武已经84岁了。在当时条件下，除由林彪当国家主席之外，其他没有合适的人选。但是，毛泽东认为林彪是不适宜当国家主席的。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过：苏联攻击我们的领导体制是“军事官僚体制”，是“军事官僚专政”，因此在机构重建上要改变这种“形像”。

毛泽东还考虑到，“文化大革命”中通过“三支两军”，林彪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实际权力，军队干部在绝大多数地方革委会中起着主要作用。这种以军代政、以军管党的作法，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他说：“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是颠倒了么？”毛泽东主张政府机构要摘“文官”班子，军队干部不宜过多地参政，因此，他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

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他借用三国的故事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这样一比，就把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讲得非常严肃了，但林彪的意见仍与毛泽东相左，他继续主张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与毛泽东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林彪一贯的表现是“紧跟”毛泽东、“主席划圈我划圈”。因此，对林彪来说，这一举动很不寻常。此后表现出来的证据可以看出，原来，林彪本人想当国家主席。

林彪认为，毛泽东早在1959年66岁时就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1970年已77岁，不可能再重当国家主席。只要设了这个职位，毛泽东不当，自然就应该由他来当。

本来，是否设国家主席允许有不同意见，即使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也不是反党行为。问题在于林彪、叶群把四届人大看作“权力再分配”的一次机会，背地里串通一些人造成声势，企图用非正当的手段控制会议，达到夺权的目的。

5月中旬，林彪对参与宪法修改工作的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他要求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7月，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的话，点明了林彪的用意：“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这时，毛泽东又一次申明自己的主张。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说：“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此后，叶群再次找到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宪法工作小组中同样存在两种意见。康生、张春桥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吴法宪、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两派意见时常发生冲突。

林彪一派虽然与毛泽东的主张相抵触，但是他们打出的旗号却是树立毛泽东的领导权威。8月13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继续讨论宪法草案稿中的文字修改问题。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有关提法发生争执。

此前，张春桥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曾亲耳听到毛泽东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张春桥以此为依据，提议删去草案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三个副词。

吴法宪不同意，他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通过黄永胜将争论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对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敢于向张春桥发动反击表示满意，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三个副词出自于“文化大革命”中最著名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开头，是林彪的发明。毛泽东已多次表示反对这样说法，他在1969年审定九大《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时，也删去了初稿中的这三个副词。而林彪仍然坚持这样提。

林彪、叶群估计在将要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文字定稿时还会有一番激烈争论。叶群遂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领袖们在称“天才”问题上的语录，准备在会上和张春桥等人“斗争”。出乎他们意外的是，8月14日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未再坚持删改意见，宪法草案按林彪一伙的意思顺利通过。

尽管如此，在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仍未改变主意。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在即，林彪便把希望放在会议期间，准备操纵会议，制造舆论，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接受。

8月下旬，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上了庐山以后，叶群关照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一事还要坚持。

林彪也暗中嘱咐黄永胜、吴法宪：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3. 林彪以党的副主席身份把个人观点假以集体决议传达给与会者 / 陈伯达抢先挑起争端 / 毛泽东说：“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

8月22日，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预备会议。这次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林彪都提到设国家主席的事，认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很不以为然，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毛泽东最后提出希望：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这些话显然有针对林彪集团而言的意味。

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了。当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按预先宣布的程序，首先应是康生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然而，林彪临时提出要讲几句话，林彪在讲话中继续坚持称天才，坚持设国家主席。这种场合下，林彪是以党的副主席身份讲话，传达的却是个人意见。他要把个人观点假以集体决议传达给与会的中央委员。他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

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整个宪法草案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袖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林彪发言后，康生表示对林彪的发言“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他说：在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林彪的讲话明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加予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与会人员没有感到异常，认为这是中央的安排。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上，吴法宪提议要全会第二天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政治局委员多数同意，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遵从众意，通过了这样的安排。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已预有准备。上庐山后，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些语录，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团伙中的人。

8月24日，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事先商定的口径，引用同样的语录分别在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坚持“天才论”，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许多人不明真相，但出于对中央的信任和毛泽东的崇拜，纷纷赞同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同时影射张春桥一伙抵毁毛泽东。

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说：“竟然有个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陈伯达的这些发言印成华北组2号简报（大会第6号简报）发给与会者。简报中还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等的发言，知道了党内竟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陈伯达的发言投合了林彪的口味。林彪听秘书读过这份简报后，高兴得笑了，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一些委员表现得情绪激动，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陈伯达充当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两个集团的斗争趋于公开化。

8月25日，已十分惊慌的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在江青带领下来到毛泽东住处反映大会斗争情况。之后，三人又来到周恩来处谈话。会上出现这种背着毛泽东的明显是有统一布置的“揪人”行动，使毛泽东感到事态已十分严重。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开始部署反击了。

在会上，毛泽东作出三项指示：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第二，

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话语十分严厉：“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他严肃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又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毛泽东的发言立即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叶群、吴法宪等人匆忙撤回、销毁自己的言论。开始，留守北京没有来庐山参加前期开会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照叶群的部署准备了一份类似的发言稿，听说山上风云突变，就悄悄地销毁了文稿。

8月26日、27日，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作检讨。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则极力安抚左右为难的吴法宪：“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林彪、黄永胜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随后，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布置统一口径，强调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能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

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上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指名批判了陈伯达。毛泽东写道：陈伯达摘的称“天才”的材料，“欺骗了不少同志”。“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扩大而已。”“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决定点出陈伯达的问题进行批判是经过慎密考虑的。如周恩来后来所言：这是毛主席考虑了三天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们的问题迟早是要暴露的。

但毛泽东的考虑显然不仅仅是陈伯达的问题。他十分策略地回避了林彪的问题，把主要责任全归到陈伯达的头上。这时期，毛泽东对林彪以及叶群、吴法宪等人采取了“保”的态度，留给他们觉悟认错的机会。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陈伯达当了林彪的替罪羊，林彪仍然高坐主席台之上，可是，他这时的心情已经不比初上庐山信心满怀了。

4.“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严厉训斥黄、吴、李、邱 / 毛泽东下决心解决林彪一伙人在党内“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庐山会议后，中央责令林彪的追随者吴法宪等人对庐山的事写出书面检查。毛泽东亲自审阅他们的检查报告，并留下严厉的批语，批评军委办事组几个成员追随陈伯达在庐山发难。

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检查书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见过。”

“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

“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书上作了十处批语，批评叶群说：“‘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对外称“批修整风”）。1971年1月8日，毛泽东提出：“军队和地方都应进行一场思想整风的自我教育。”

毛泽东部署了全党的批陈整风，但他的关注点却在军委办事组里面与陈伯达问题有直接联系的那些人。叶群、吴法宪等人交上一纸检查之后，便不再诚心地反省自身的问题，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十分不满。

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对批陈整风的指示：“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毛泽东发动的批陈整风使林彪集团在政治上更加被动。但毛泽东的本意并不想打倒林彪，他对林彪还是寄予希望。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曾同林彪谈过话，林彪没有任何认错的表示，批陈整风开始后，毛泽东明确提到，“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1971年3月29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偕李德生以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北戴河见林彪，告知中共中央即将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毛泽东希望林彪出来参加一下这个会议，讲几句话，就此作个了结。

而林彪从一开始就不准备承认错误，对毛泽东的指示，他采取了软拖硬抗的态度。表面上，林彪表示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检讨“很高兴”，同意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要吴法宪和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的意见。他说“绝没有想到”陈伯达的问题这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他“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林彪当面提出要黄、吴、李、邱在会上“检讨”，表示他自己将不出席会议。林彪还为其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作了辩解。

周恩来一行从北戴河返回后，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不高兴。当即指着黄、吴、李、邱严厉训斥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当着众多人的面，毛泽东没有直接对林彪表示不满。

几天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派纪登奎、张才干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这表明毛泽东对黄永胜、吴法宪把持下的军委办事组的不信任。

4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李、邱的问题被提到了

更高的高度。周恩来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九大”的分裂路线上去了。

4月19日，林彪回到北京，周恩来立即给他送去了正在进行中的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材料和毛泽东的批示，并再次表示希望林彪参加会议，但林彪拒绝出席。

九届二中全会前后，尤其在批陈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逐渐觉察到林彪把持下的军队一批人的不正常活动。毛泽东开始采取措施打击和削弱林彪集团。一是接连批发许多文件和指示，毛泽东称之为“甩石头”；二是派纪登奎、张才干参加军委办事组，削弱林彪对军队的控制，即毛泽东所说的“掺沙子”；三是更换北京军区主要领导，改组北京军区，毛泽东把这个办法叫做“挖墙脚”。

此前，还有一些反常的事使毛泽东对林彪一伙人逐渐产生了警惕。

1970年7月下旬，为了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题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社论。在27日讨论修改社论的政治局会议上，出现了一场小风波。当时越来越接近林彪的陈伯达同张春桥为稿子中一处提法发生了争执；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张春桥坚持不改。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两天后，周恩来陪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外宾时当面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让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四个字。最后的表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对这种说法显然不满意，他说：“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后来，毛泽东谈到这事又说：“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不是我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毛泽东感到林彪突出他在军队中的地位是有用心的。

还有，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林彪背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庐山上修建飞机场。场址正选在预定安排毛泽东住的房屋背后的山顶上。汪东兴发现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查问是根据谁的指标示修建的。黄永胜说是他下“命令”建的，经过“林副主席批准的”。这虽不是什么大事，但按常规，事先必须报告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并经他们同意才能进行，毛泽东了解情况后，点了点头没有作任何表示。

后来，毛泽东要汪东兴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得知庐山周围部署有陆军师和空军师，陆军的坦克内有火箭装置，空军的装备机动能力很强。汪东兴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所以，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以点陈伯达为名，揭露林彪一伙，“配合得很好了”，“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庐山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又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通过批陈整风，下决心解决林彪一伙人在党内“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虽然批陈之火暂时还没有烧到林彪的头上，但是毛泽东的一系列措施使林彪更紧迫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林彪对毛泽东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1971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晚会上，林彪丢掉往日对毛泽东礼数周到的惯例，

姗姗来迟，只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默默对坐几分钟，即不辞而别。

庐山会议结束了，庐山阴云却久久不散。暗地里，林彪一伙开始构思更大的阴谋。

5. 林彪决定用武力夺权 /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被捧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 / 林立果在上海召集“三国四方”会议，部署武装行动

庐山会议是林彪集团用和平方法夺权的一次尝试。失败以后，林彪意识到毛泽东的威望足使其以个人意志左右全局，这不是用正常方法可以撼动的，必须另谋它途。

按照正常的思路，林彪已是写入党章的接班人，等待毛泽东百年之后自然接班即可。可是，对此，林彪、叶群还有独到的认识。

他们认为，法定的接班人未必是最终接班的人，尤其是文化革命风云变幻，不确定因素很多，前任接班人刘少奇就是一个实例；从身体状况看，林彪体虚多病，虽然年龄比毛泽东小十多岁，怕是活不过毛泽东；再者，江青、张春桥集团实力日益提高，林彪一伙估计将来张春桥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认为“目前的趋势是用张春桥。”

然而，对林彪集团最紧迫的威胁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觉察到林彪等人图谋不轨，这个团伙有被摧毁的危险。情急之下，林彪决定用武力夺权。

1971年2月12日，林彪借口养病，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来到苏州。此时，批陈整风运动正当炽盛之时，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分析了形势，经过密谋策划以后，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他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此后，夺权重任落在了林立果的肩上。

林立果，小名老虎，被林彪称做“眼珠子”，1945年出生，1967年3月入伍。林彪把他放在空军。

初入伍的林立果还不是党员便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4个月之后，空军司令吴法宪、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亲自作介绍人，林立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彪对惟一的儿子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不遗余力地推荐任用林立果。1969年2月16日，林彪亲笔写信给周宇驰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提出要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这年10月，林彪又在毛家湾召见吴法宪，当面授意吴法宪提拔林立果。

10月17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职）。当时，林立果24岁，入伍不足三年。

次日，吴法宪召集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和周宇驰、林立果等人开会，指示：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指挥。周宇驰、王飞等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作了传达。吴法宪未经中央军委批准，私自把空军指挥权和调动权交给了林立果。

林立果利用特权在空军中网罗起一批人，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名义上，“调研小组”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

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是林彪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

为了推动林立果的工作，林彪特意召见了“调研小组”成员。1970年5月2日，在毛家湾，林立果、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调研小组”要员齐集一堂。林彪问：“谁是你们的头？”周宇驰等人心领神会。次日，几个人专门开会，向林彪表忠心，郑重推举林立果为“头”。

为使林立果顺利行使非常之权，1970年下半年，吴法宪控制下的空军开始极力地宣扬林立果，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

一次，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吴法宪的老婆陈绥圻率先制造舆论：“应该向立果同志学习，立果同志在林副主席、叶主任身边，领会林副主席指示深，主要还是立果同志天才，从各方面来讲是我们的老师。”此后，抬高林立果的言论层出不穷。

“立果同志的指示要及时传达、照办，坚决照办。”

“对立果同志的态度和对毛主席的态度是一致的。”

空军政治部通过决议：对林立果，要“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的指挥”，林立果“要求什么，就做什么”等等。

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所谓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起草的。林彪听了报告录音后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之后，吴法宪、周宇驰等对“讲用报告”大肆吹捧，把林立果说成是“超天才”。

吴法宪称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周宇驰、王飞、于新野等人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林立果的报告印行7万多册，广为散发。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非常不高兴，他多次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就在1970年10月，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不久，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更名为“联合舰队”。叶群为周宇驰、王飞等规定了称呼代号。林立果是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为自己取的代号是。康曼德”（英文司令官的译音）。这个“联合舰队”是一个秘密组织，是林彪谋害毛泽东，策动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当中央批陈整风使林彪集团在政治上越来越被动之时，林立果“联合舰队”的武装开始壮大起来。

从1970年到1971年9月13日，在林立果、周宇驰的指使下，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7341部队政治委员王维国、广州民航局政治委员米家农和广州部队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空军内部设立了14个秘密据点。林立果一伙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林彪一家苏州密谋之后，林立果即赴上海主持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召集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在3月18日至24日起草了《“571工程”纪要》。

“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九·一三”事件后，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一份于新野手写的（“571工程”纪要）。全文分为九个部份：（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该纪要分析，目前“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枪杆子方向发展。决心要走向中国政治顶峰的林彪认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估量自身的实力后，林彪一伙决定“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

林彪把政变的赌注押在空军。一生搞军事的林彪看上了空军这支装备现代化的新军种。。571工程”纪要中说明了其中的原因，“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

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开了有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7341部队政委王维国、7350部队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参加的秘密会议（即“三国四方会议”），分别指定王、陈、周为上海、杭州、南京三个地方的“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与此同时，一批政变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了。广州的米家农成立了“战斗小分队”，队员要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订了联络密语、暗号。上海的王维国成立了“教导队”，并仿造7.62毫米轻型冲锋枪。王提出要把“教导队”培养成誓死捍卫林彪地位的。坚强战斗集体”，并指示“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战斗小分队”等组织的内部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例如：不准向外泄露小分队的情况；不准与原单位人员接触；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不准随便接电话，电话由专人接；不准谈论“首长”活动去向、生活习惯等等。

在“联合舰队”中，队员对林立果要绝对忠诚。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反复学习的材料，林立果的话被编成语录。他们内部有一首队歌，翻来覆去唱的是“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队员还要宣誓。下面是一则誓词：

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宣传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

4月下旬，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正在进行之际，“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秘密聚会，讨论中央批陈整风会议情况，确定“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施《“571工程”纪要》。

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供述及调查得到的材料看，林彪一伙人准备在毛泽东南巡途中谋害毛泽东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第一种，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泽东。

第二种，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取的，就是在毛泽东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

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来火焰喷射器部队，后来由于没有估计到毛泽东行动的变化，这支部队没有来得及调出。

第四种，是用四〇火箭筒和100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四〇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飞机的，这两种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强，对付火车不成问题。

第五种，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

第六种，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

第七种，是策划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关枪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把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抓凶手，看见活的就把他干掉。

第八种，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型飞机来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另找飞行员来轰炸。

“纪要”制定的行动目标就是“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指毛泽东）”。

6. “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这个当中有‘鬼’”， / “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按照中央的要求，会议情况要在一定范围内传达。但是黄永胜等人掩盖自身的问题，在军队系统拒不传达，以致总参部长一级干部也不了解会议的内容。

1971年7月10日，总参某部副部长熊向晖陪同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中美外交会谈情况。汇报之前，毛泽东首先向熊向晖了解了总参谋部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实情。毛泽东当即断言：“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根据批陈整风的种种反常情况和审查陈伯达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对林彪集团活动的目的性产生了更大的怀疑。他决定利用每年例行的外出巡视工作之机。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帮助地方高级干部，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认识九届二中全会问题的严重性，捅开中央内部的矛盾和问题，使大家了解林彪一伙阴谋活动的情况，防止党内同志因不了解情况而继续跟着林彪一伙走。

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去南方视察。首先到达湖北武昌，同刘丰、刘建勋、王新谈话，后来又同华国锋谈话；到湖南长沙后，同华国锋、卜占亚，后来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随后到了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到达浙江杭州后先后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谈话；在上海同王洪文、许世友谈话；回京后在丰台停留时间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这些人当时分别担任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上海、江苏、北京等省市区和武汉、广州、福州、南京、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在谈话中批评了林彪集团自庐山会议以来的不正常表现，点名指出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以及黄永胜

等人。

谈话中，毛泽东历数党内路线斗争史，反复申明一个后来叫响全国的口号：“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声明“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毛泽东说：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有困难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全国胜利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

“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

“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他们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指黄、吴、叶、李、邱）以外”。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那份简报（指华北组2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可能是心里有鬼”。

毛泽东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

“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毛泽东还对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离开武汉前，毛泽东又对刘丰等人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回北京以后，我还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毛泽东叮嘱刘丰不要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告诉别人，并说，我是给你打招呼，有些事回去（中央）还要讨论。刘丰当即作了明确表示：不会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全党要增强团结，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泽东多次和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起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去做。”“一

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毛泽东还逐句讲解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他说：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最重要，“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讲到后两条时，强调部队在整风中要防止和克服骄傲自满和军阀作风。

在杭州，毛泽东追问陈励耘及空军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的事，陈回答时含糊其辞，毛泽东就讲：你们要搞“三要三不要”，“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随后又对陈励耘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要陈等听话要分析，不要受蒙蔽。陈励耘听了表情紧张。

在各地的谈话中，毛泽东也表示他对林彪宣扬的个人崇拜的反感。他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

毛泽东还说：“我不是天才，读6年孔夫子，读7年的洋学堂，到25岁那年正是1918年开始读马列主义。”“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大讲天才，毛泽东明确讲，这“实际上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说到军队，毛泽东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感到军队的问题严重。他在谈话中说：“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军队中滋长的居功骄傲和宗派主义，足以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国家稳定和“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毛泽东强调说：“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

“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

“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毛泽东特别点了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毛泽东说：“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毛泽东对黄永胜不肯检查错误，紧跟林彪有意见。而当时林彪也紧紧抓住黄永胜不放，他需要黄永胜代表他控制军队。

毛泽东又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就是那三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

在杭州，毛泽东与陈励耘等人谈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毛泽东面向陈励耘，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陈励耘很紧张，敷衍回答：“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毛泽东说：“是啊，说话不准确！”陈励耘接着说：

“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毛泽东说：“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了？陈歧歧唔唔没有回答。”

南巡谈话中，在庐山上上当受骗而犯了一般错误的干部都坦率地向毛泽东承认错误，表示改正。韩先楚对毛泽东说：“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在上海，毛泽东对许世友说：“庐山会议想得如何呀？是不是思想上解决了问题了呀？”许世友马上回答：“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犯一般错误的同志是谅解的。他说：我认为犯点错误不要紧，属于认识问题，现在认识到了就好了。问题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他还说，“我可以耐心等待”，“回到北京以后，或一个一个的，或者三、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包括“再找林彪谈谈”。

南巡途中，毛泽东又了解到林彪、叶群一伙活动的某些情况。8月31日，在南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来林彪周围的一些异常动向：7月上旬，周宇驰秘密来到南昌将一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来南昌时曾提醒程的家属以后少同林家来往，说搞不好要惹下杀身之祸。毛泽东获悉这些情况后，进一步引起警觉。

7. 林彪决心先发制人，趁旅途中杀害毛泽东 / 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 / 毛泽东到杭州后，立即感到情况有些异常 / 毛泽东意识到问题更为严重，马上采取了防范措施

毛泽东一路上与各地要员谈话时，一再强调谈话内容不能外传。9月5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参加了广州军区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听取军区首长内部小范围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军地干部时的重要谈话。当时会议宣布，不准记，不准传，不准向北京打电话报告传达内容。但是当晚，顾同舟与于新野通电话时，即全部透露了所知道的内容。次日，周宇驰驾驶直升机到北戴河，将于新野整理的顾同舟电话记录稿送交叶群、林立果。

9月6日。李作鹏在武汉陪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参观时，想尽一切办法要了解一些毛主席南巡谈话的内容。他感到人们对他的神态不如以往自然，言谈中存在一种神秘的气氛，没有人主动与他谈起毛泽东不久前抵武汉的任何事情。

李作鹏找机会单独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坐下来，经过恐吓利诱，刘丰不顾曾向毛泽东当面作过的保守秘密的保证，将毛泽东与之谈话的详细内容告诉了李作鹏。

搞机要工作出身的李作鹏非常清楚毛泽东这一番谈话的特别含意。他异常震惊，脑子快速地思考着，很快得出三点认识：即九届二中全会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似指向林彪。当天，李作鹏匆匆返回北京，将从刘丰那里得来的消息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连夜打电话转告在北戴河的叶群。

蛰居北戴河的林彪，时刻关注着北京毛泽东的动向。毛泽东南巡后，林彪即敏感到意识到毛此行具有特殊意味，开始多方打探消息。

8月16日，毛泽东动身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根据毛泽东指示，来到北戴河面见林彪，谈准备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问题。联想到一年来自己团伙中人的处境，毛泽东对其追随者的多次严肃批评，林彪感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中他将地位难保。得到各路亲信对毛泽东谈话内容的密报之后，林彪更加确信，毛泽东即将对他采取措施。

“571工程”纪要中关于政变的战略时机规定：“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的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现在正处于这种关头，数十年军事和政治斗争的经历，林彪深知把握战机的重要性。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紧急密谋之后，决心先发制人，按计划行动，趁旅途中杀害毛泽东。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

9月8日，林彪发出亲笔书写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在北京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向“联合舰队”成员刘沛丰、江腾蛟、王飞、李伟信和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0190部队政治委员关光烈等人传达林彪武装政变手令，具体策划部署政变方案。

预定的行动方案分为南北两线。北线以北京为中心，由王飞任总指挥，任务是在南线得手的同时，将北京的主要人物，包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以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统统杀死。王飞等人还勘察了钓鱼台和中南海的地形。准备用坦克撞开中南海的墙冲进去杀人，也有人提议用导弹射击中南海。

为了让王飞与把持军权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建立直接联系。8日，林立果还从北戴河带回7叶群给黄永胜的密封亲启件，让王飞送给黄永胜。10日上午，王飞将密封亲启件交到黄永胜手中。同日，叶群与黄永胜频繁进行了电话联系。两人一日内通话5次，最长的两次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

这一天，刘沛丰又从北戴河带回一封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信中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此信仍由王飞在必要时送黄永胜。

南线以上海为中心，由江腾蛟任总指挥，任务是在旅途中杀害毛泽东主席。

在上海的王维国接到一级战备的命令后，立即指示“上海小组”成员要“注意隐蔽”，不要被人发现。随时准备按照林立果的要求，进入下一步行动。

9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于新野也来到杭州，向陈励耘布置刺杀毛泽东的计划。毛泽东到杭州后，立即感到情况有些异常。

首先，对他的警卫工作，按惯例是由地方管的，而这次却由驻地空五军的政委陈励耘掌握杭州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一些多次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看望毛主席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

其次，毛泽东预先知道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跟林彪一伙很紧，起了很坏的作用。而毛泽东在与陈励耘等人当面谈话时，陈励耘不是说假话，就是避而不答。毛泽东已掌握了吴法宪在上庐山前，给陈励耘打过“招呼”，但陈励耘却回答说，上山前不知道他们的这些事。当时，毛泽东没有戳穿他说的谎话，不露声色地继续谈下去。

第三，从空五军派到毛主席身边做服务工作的一些人员神色慌张。个别人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热爱，将陈励耘布置的监视任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心中更有底了。

另外，毛泽东得到消息说，杭州空军在改装伊尔—10型飞机，飞机上装有炸弹和机枪；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毛泽东意识到问题恐怕比他想像的更为严重，他马上采取了防范措施。

毛泽东找来汪东兴，要他把专列转移。9日凌晨，专列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静观动向。随后，毛泽东调整了行动计划，亲自掌握专列的行止。专列随时准备，做到要行即行，要停即停。

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指示：出发，去上海；不要通知陈励耘送行。

临行前，陈励耘还是得到消息赶来了。见到毛泽东表情严肃，陈励耘心中疑惑，神情很不自然，不敢接近毛泽东，也没有握手告别。

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上海。此时，于新野已经来过上海向王维国布置了政变方案。在上海，毛泽东不下火车，不去已经准备妥当的住所，只叫人打电话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见。

列车一停，汪东兴就下车观察地形，把随同毛泽东行动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中央警卫团的干部队100人部署在毛主席主车四周警戒，严防不测。地方警卫部队一律撤至外围。专列停车地点150米处有个机场油库，对列车的安全有严重威胁，汪东兴派出专人把守。炸掉这座油库正是林立果准备杀害毛泽东的诸方案之一。

次日，毛泽东在火车上同王洪文、许世友谈话。谈毕，毛泽东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吃饭。二人走后，毛泽东即指示汪东兴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先发前卫车。”

9月11日中午12时半，专列离开上海，呼啸北上。车到南京停留15分钟；在蚌埠停车5分钟；到济南停车50分钟，在这里，汪东兴按毛泽东吩咐临时通知北京市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在丰台开会；车到德州停车20分钟；在天津西部停车15分钟；12日下午1时10分，列车开进北京丰台。从上海到北京一路上只用了不到25个小时，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的。

按照原来计划，毛泽东要在上海、南京一带小住，到9月底返回北京。林彪、林立果一伙也是按照这一个时间表策划在上海、江苏硕放铁路桥等处布置谋害活动的。由于毛泽东一反常规，行踪莫测，林立果“联合舰队”的南线行动方案未及实施即破产了。

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丰台后，停留了3个小时。在这里，毛泽东指示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增强北京的卫戍力量。利用这几个小时时间，列车工作人员摸清了北京的情况，随后把专列开回北京站。

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就睡下了。从杭州到北京，毛泽东已有3昼夜没有很好休息了。毛泽东从12日下午，直睡到13日凌晨1时。

当下，汪东兴在中南海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时，周总理惊讶地说：“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就在9月10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汇报中央为召开

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作准备的情况，信中提议补选几名中央委员。毛泽东阅后，批示：“还要补选常委。”毛泽东已开始准备进行组织上的调整了。

8. 林彪预先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或叛国外逃作了准备 / 恐慌之中，林彪决定改南逃为北叛 / 周恩来用力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说了两个字：“叛徒！”

林彪在派遣林立果主持杀害毛泽东的同时，也考虑到林立果一伙或举事不密，阴谋败露，因此，他预先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或叛国外逃作了准备。

9月10日，林彪和叶群指使周宇驰等人从空军司令部索取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中国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北京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圈和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以及广州、福州地区机场的资料。

毛泽东离沪北上的当天，9月11日晚上，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向林立果、周宇驰报告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消息和与其谈话的内容。林彪、叶群获悉杀害毛泽东的计划流产，立即决定实施另一方案：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策划“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分别同江腾蛟、王飞、于新野、胡萍和空军司令部情报部副处长王永奎等布置南逃。周宇驰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据点，找胡萍密谋，调飞机南下广州。胡萍安排了飞广州的飞机8架，当晚派256号专机送林立果去山海关，并将这架飞机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使用。为了掩盖阴谋，胡萍将256号专机谎报为一般客机252号。

12日晚，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慌慌张张地部署带林立果和女儿林立衡潜逃，与叶群、林立果素来不睦的林立衡将情况报告了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警卫部队迅即报告了北京的周恩来。

当晚10时许，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周恩来总理得悉林彪一伙的不正常举动，当即指示北戴河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林彪等人的新的动向，随时报告；并要吴法宪查询停留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的情况，命令专机返回北京。

当吴法宪奉总理之命向胡萍查询飞机情况时，胡萍一面谎报飞机去山海关是飞行训练，并伪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拒不执行调机回北京的命令；一面将周恩来追查飞机行动的情况报告周宇驰。周宇驰转报了林立果。

23时半，周恩来亲自给叶群打电话询问，叶群称林彪要“动一动”，是“天上动”。周恩来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并且提出打算到北戴河来见林彪。

鉴于周恩来查问飞机情况，林彪、叶群觉察到南逃阴谋可能已经败露，恐慌之中决定改南逃为北叛。

为了限制256号专机的行动，周恩来指示李作鹏：256号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但李作鹏将命令传达给海军山海关机场场站时，却篡改改为“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并说，“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

9月13日0点20分，256号专机在作起飞准备，飞机尚未发动时，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发现情况异常，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没有采取

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推托说：“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如此拖延了时间，使林彪得以乘机外逃。事后。李作鹏又涂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由北戴河驻地乘车急驰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一伙仓皇登机，不等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上机，便强令飞机起飞。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令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跟踪，随时报告飞机飞行情况；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同时向全国发出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还指示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要林彪等人飞回来。并说：不论飞机在何地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林彪的座机一律不予作答。

天空中，飞机向西飞了一段后，即调转方向往北飞行。在空军司令部的李德生通过专线电话，不断将林彪座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向周恩来报告。当飞机飞临中蒙边境，很快将越出国界线时，李德生向周恩来请示处置办法。周恩来表示要请示毛泽东。

周恩来与汪东兴一同来到毛泽东住处叫醒熟睡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沉思一会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林彪事件之后，社会上有许多传闻，不相信林彪是自取灭亡。周恩来在广州曾就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他说：他（林彪）是副统帅，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真相大白。

凌晨1时50分，256号飞机越过中蒙边界上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用力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说了两个字：“叛徒！”

凌晨3时许，256号飞机飞临蒙古的温都尔汗附近因油料将要用完，飞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强行迫降。迫降时，机身擦地爆炸起火，机上人员全部摔出，焚烧致死。

不久，周恩来再次得报，9月13日凌晨3点15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携带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一架直升机外逃。经请示毛泽东后，周恩来指示：“要它迫降，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他飞走！”

根据命令，李德生指示北京军区空军起飞了8架歼-6飞机拦截，歼击机从上向下开炮，迫使直升机回头，最终飞机迫降在北京市怀柔境内。降落时，驾驶员陈修文被周宇驰杀害。之后，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李伟信被活捉。

林彪外逃后，黄永胜等人情知难以摆脱干系，为了掩盖他们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开始日夜焚毁他们与林彪、叶群等有关的信件；材料以及笔记本、照片等。

9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周恩来代表中央执行了抓获黄、吴、李、邱的命令。

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以叶剑英为主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此，林彪集团被逐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对林彪事件的发生，周恩来事后说过：它既在预料之外，也在预料之中。说“预料之外”，是指他和毛泽东都没有想到林彪会突然乘飞机叛国出逃。他们事前也没有觉察林彪一伙策划反革命政变的罪恶勾当。

周恩来说：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跑；因查问他私调飞机一事，他心惊胆战，逃跑了。毛泽东也多次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

说“预料之中”，是指林彪一伙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阳奉阴违，抗拒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们的批评帮助。对他们的这些表现，毛泽东、周恩来是心中有数。周恩来曾指出：对林彪，毛主席一直是保他的，事实也证明对他是仁至义尽了。

又说：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注：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表示了对林彪大肆鼓吹的个人崇拜的一些说法的不满）林彪最反感了，他这个人一辈子不能批评，一批就消极。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性。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政治开始逐步恢复正轨。1980年，中央决定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罪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1980年11月—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经裁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有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6—18年。

林彪为了篡党夺权，组织阴谋集团，最终落得折戟沉沙，抛尸荒野。这位战争年代的常胜将军，建国后政治斗争的佼佼者，一生中胜利与荣耀时时相伴，同代人无有出其右者。可是，他指挥的最后一个“战役”却失败了，是血本无归的覆没。

早在5年前，“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始，林彪作为这场运动的狂热鼓吹者，在他著名的“政变经”（即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

“不要做违反历史前进的事。做这种事，害人害己，身败名裂……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林彪及其死党的行动和结局可以作为这句话的注脚。

□ 原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知情者说》

~~~~~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二十二）

• 周孜仁 •

（续上期）

19，《横眉》和《815战报》成都版

在关于重庆文革的史料上，65事件被公认为首次、最严重的流血事件。打斗规模确实不

小，双方动员的人都多达数千。双方以此为题材大造舆论，也算是造得够耸人听闻了，耸人听闻得有些类似天方夜谈。遗憾的是，这场血案双方都难论输赢：砸派虽被赶出了图书馆大楼，而施家梁对815追捕伏击，使之损兵折将，还俘获大将一员：熊代富，两相比较，815还算吃了点亏。于是，815便总结了惨痛教训，以为第一，不能老说自己怎么被动怎么受害，仅仅博取老百姓的同情已毫无意义。解决问题，归根结底得靠自己“跔儿”（拳头）大。基于这一点，重庆各区八一五派便有了建立“捍红指挥部”之举，反到底派自然毫不犹豫，北碚猛虎团、黄山警备区等专业武斗组织也纷纷建立。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著名的野战部队（301）和“卫戍司令部”（302）也就在这个时候先后成立。部队成立后，还专门去搬装公司延请一位武林高手作教席（名字已不详。只记得他三十上下年纪，精瘦，中等个儿，一脸英气的，如果当时有香港版功夫片上市，人们定会把他和成龙李连杰之流联系起来一起加以崇拜的），上千大学生每天在此武星带领下练拳习武，喏大的团结广场便杀声震天了，很有些全民皆兵的豪迈景象；其二，大家深刻认识到：宣传舆论也不能一味高姿态了，光一个《815战报》已经不行，《815战报》就喜欢高姿态，就喜欢煞有介事地讲大道理，训人。对于此，大家意见已经很大了，总团于是决定办一份低姿态的、专门损人骂人、让人解恨出气的报纸，这份报纸，就叫《横眉》。

当时我刚从北京回来，整日闲游浪荡。总团勤务员黄顺义就把我叫住了，要我主持。筹备会是在《815战报》办公室开的。参会人员有杨宪腾（动力系）、吴明才（无线电系）、龚堂光、吴红彬（采矿系）、窦绪昭（系班不详）等。这些同学就成为了编辑部的主要成员。我知道自己性格使然，骂人损人绝非强项，但还是把事情应承下来了。关于刊名，开始提了好些，最后确定的《横眉》——这名字是我取的，所以火药味依然不够浓。

《横眉》于是1967年6月创刊，因其宗旨是向砸派作“低姿态”舆论进攻，到第二年中央“315”指示下达，即815被中央狠批一顿，该报文章就很难做了，从此终刊，不再为继。该报纸我虽也算是始作俑者，但从来没有管过。该报一共出版过多少期？发过些什么文章？我一无所记。具体主持《横眉》的同学叫杨宪腾。我之所以没有介入该份报纸，现在承认，事情和杨大有干系。

杨宪腾，四川泸州人。动力系四年级学生。八十年代移居美国，现在美某公司编写软件，1995年回乡省亲，专程取道深圳出境，曾同我一道小住数日。他的穿着言谈还和学生时代毫无二致，随便简单得很。有一天去珠海游玩，他唯一的一件西装外套遗失船上了，返回房间时，只见他穿一身暗红色毛衣，书包斜挎肩头，毛巾胡乱扎在包带上，一幅典型的红卫兵装扮，我于是大笑，说他：“革命大串联回来啦！”他说：“在美国，我从来随便如此！”我说：“你们美国佬不讲点企业形像么？许多深圳公司上班还要求西装革履呢！”他说：“要什么企业形像？我们老板专门拉拢国防部，做政府定单。不关我们的事！”只是谈及文革经历和去国生涯，他会流露出许多沉重和无奈。年轻时候，杨为人为事热情奔放，嫉恶如仇，嘴巴尤其其不忌生冷。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红五条”下达当晚，重庆大学举行辩论大会，第一个跳上台怒气冲冲大骂“给老子哪个搞起的”，那位仁兄，就是他。如此脾气火爆者参与《横眉》编辑应该说再合适不过了。我虽然对于他印象一直不错，但要由他来担纲报纸编辑，我却有点心里发怵。前面说过，他家庭出身极端可疑，刚进大学，他报名参加美术队，正好由我主持招考，严格讲，他的绘画水平不低，但一了解政治面貌，方知乃父49年随国民党跑了台湾，问题就很严重了。我的家庭本来就可疑，故而尤其害怕沾惹屁股上屎比自己还多的人，便把他拒绝了，作为补偿，同意他以编外人员身份参加活动，对此，他毫不介意，一直和我交好如素。文革动乱，到处都是陷阱，随时随地都是未知的厄运，我总希望有一个出身硬扎的人和我搭档，出了问题好帮忙担待些，哪敢再找一个包袱给自己背上呢？基于这一点，杨既然愿意揽事，我便趁机溜之乎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我如此机会主义，小心翼翼做人，毕业时候，还是和杨宪腾一起被揪出来，和他同时住了学习班，一起写了两个月的检讨。

既然我不愿主持《横眉》，总团就让我到了成都，去协办《815战报》成都版。成都版五月份刚刚创刊，编辑是赴蓉挺进纵队的三位同学：王益富、黄肇炎和刘新泉。王和刘都是校业余体育队队员。王习长跑，因为年级低（机械系一年级），运动成绩平平，常被高年级学生当成马仔呼来唤去，皆因写得一手好字和一手好文章，文化革命遂让他大出风头而自信心亦大大增加，独行校园，他总是高视阔步，鞋底如置弹簧，走路时肩头永远一颠一耸，好像随时准备向全世界发布宣言。还有一事给人印象尤深，那就是，王不知从哪儿弄来留声机一台和老唱片若干——大约“破四旧”时收缴的——放在枕头边上，每天不厌其烦地来回播放印度歌曲《拉兹之歌》，而且只听过门，过门一完，演员正要开唱，他毫不留情，马上又将唱针放回起始位置：重来，嘴巴同时大叫一声：“巴实！”。“巴实”是四川俚语，“真棒”之意。听他大呼“巴实”的神态，你准会想起超级球迷高呼“好球”时的疯狂和满足：足见他的文革生涯是很愉快的。他愉快，还因为文化革命确实让他得了很多实惠，比如，参加四川问题的学习班离京回川，他搭乘便机偕54军军官们返回，成了莘莘学子中第一个坐飞机的人。同学们羡慕万端，齐问他感觉如何？他愈发得意了，答道：“总而言之：巴实！”大学毕业，他还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一份让人羡慕不已的好工作：给十三军军长张英才当秘书。大约仕途太顺，政治柔性就差，一遇挫折就受不了。1976年毛逝世不久，他为军领导某某给江清草拟“劝进书”一份。江青一倒，上面追查下来，该领导还稳如泰山呢，他呢，偏偏无法承受，拔出手枪自杀了。成都版的第二位编辑刘星泉是乒乓队员，喜欢写诗，于是就多一些诗人的多愁善感而少一份造反派的张扬。黄肇炎虽然没参加体育队，但足球踢得极好，思维缜密，做事有条有理，动手能力极强，做饭、裁衣、打家具样样精到，一个天生工程师的料，皆因为出身可疑，所以在报社内部，也只能做些具体的文字工作，出风头的勾当，就都留给低年级的王益富去处理了。

我是六月中旬到成都的，其时，成都版已经办了二期或者三期了。我参与的仅为第三期或者第四期，内容都由王等三人编写，我只是在编排、画版样等方面帮助做些技术指导。该报因我一份都没有保留，所以内容也无法记起。只记得刚到成都几天，成都形势便急剧恶化，报纸办不下去了，我很快重回烽烟四起的重庆。王、刘、黄三人也于三个月后撤回学校。《815战报》成都版，成了一现昙花。

所谓成都形势急剧恶化，情况是这样的：

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是五月六日下达，就在当天，成都发生了造反派冲击飞机制造厂而该厂保卫人员开枪还击，打死打伤数百人的流血事件，该事件直接导致了保守派“产业军”的迅速瓦解。按一般规律，保守派垮台后，造反派内部还应该有一个短暂的蜜月，可惜，红透半边天的省革筹副主任刘结挺及夫人张西挺上任伊始，便毫不掩饰地采取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政策，将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之间矛盾的迅速催化。6月20日，成都军区出了一个为成都兵团、八二六，万县主力军，宜宾方面军等组织平反的公告，平反自然没错——现在找不到公告原文——估计具体措辞和政策却对红卫兵成都部队多有不利，按住葫芦起了瓢，没坐牢这帮造反弟兄当然又不高兴了。作为红成的铁哥儿们，当天我的日记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心情。日记称：“没有什么可抱幻想的了！……除了造反，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还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地院的小将们把头都推得平平的，准备当反革命！/小将们呼出了呼天抢地的口号：‘生作毛主席的红小兵，死作毛主席的红小鬼！’/红成在大街上游行，整齐、威武、像九月的白色恐怖下那样。/红卫东的工人在街上游行，整齐、雄壮，他们高呼：‘红成小将往前冲，后面有我红卫东！’……”（“红卫东”是当时成都东郊片区红成派的工人造反组织。东郊片是成都有名的工业区，产业工人力量很强大的。几十年后情况当然大不一样了，国营工厂纷纷倒闭或者萎缩，当初为捍卫毛泽东出生入死的产业工人纷纷下岗失业。成都东郊片成了成都“穷人区”的代名词——笔者注）

6月24日，成都地院和工院的学生砸了省革筹办，据说抄出了整红成和815的大批黑材料。还不解恨，于是又有6月25日红成冲击成都军区、捉拿刘结挺之举，捉人不得，撤离军区时，红成扬言要到北京去直接找毛泽东告状。那情状，好像毛是他们远房亲戚似的，只要御状一告，刘张这帮权贵就注定顷刻之间垮台无疑。于是，6月26日，人民南路广场（即今天府广场）隆重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欢送红成小将北上京城。由是，开始了成都文革历史上有名的千人上京告状大行动。这次活动一定艰苦卓绝。从815战报32期的报导：“七月十日，陈伯达同志亲自打电话给广元军分区，要军区派一武装班护送红成一百名代表上京 / 红成地区总部已于七月十一日早五点二十一分在解放军的护送下，一百名代表乘34次车从广元赴京”。6月26日出发，7月10日才到广元，很艰苦了。关于这次行动的另一份原始记录，见于黄肇炎八十年代的一份说明材料。其时，重庆大学重掌权柄的一两位当权者对当年造反的学生总有骨梗在喉之感，于是四处发材料、搞外调，如追索负案在逃的犯罪分子。黄肇炎其时已在云南边疆群山之颠某炸药厂任总工，获得了国家和省级科技奖项，尽管如此，远在母校的那一两位当权者仍不想让其轻易漏网。黄于是做了如下交代：“1967年6月22日，因支持红卫兵成都部队北上告状，受挺进队派遣，随同红成去北京。当时纵队负责人是郑全体、张正茂、童正荣。我们一行20多人，由童正荣、何培余带队，同行有刘兴泉、陈开阳、李川荣、张胜科、覃文发（担任总务）、任开祥……7月7日到达北京，住二轻部接待站。到京后，我们在重大815驻京联络站的领导下参加文革。驻京联络站负责人是动力系曾世明……”

上北京告状，尤其徒步上京告状，对于重大学生绝对是强项，红成兄弟上京，重大815赴蓉挺进纵队全力配合，当属天经地义。只是编辑部三个人走了两个，剩下一个王益富也不知身遁何方，我一个局外人，工作也就难以为继了。当时我们编辑部设在华西医科大学（当时叫四川医学院）。华西医大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名牌大学，所在地是有名的华西坝。校园风景如画。晚霞里的钟楼、肃穆的大屋顶、静悄悄小溪和草坪都是成都风景照片上的经典镜头，我儿时梦中的圣殿。可动乱年月，我住那儿却丝毫感觉不到半点诗意。我们住在解剖房里。四周都是储放死尸的黑柜子。打开盖板，全是被肢解的耳、鼻、头、手、五脏六腑，浸泡在称为福尔马林的黑色液体中。有喜欢恶作剧的中学男生，经常从液体里提出某个人头或某条手臂，跟着女孩子追，追得女孩们惊吒吒地乱叫。和肢解的人体一起生活实在难以寻觅出诗情画意。年迈的父母亲依旧住在劫后的老屋，整天躺在狼藉不堪的稻草之中。我没有回去和他们同住。血雨中的重庆时时在召唤。我只在家乡呆了十余天。我决定走了。

是6月29日晚上乘坐301次车返回重庆的。那一夜，四川盆地天气特别闷热，半夜还下了一场大雨。雨滴砸在车顶上劈劈叭叭乱响。我在当天的日记上非常娃娃气地写了两句话：

“长夜欲晓天更暗，残冬将尽雪更寒。”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hwx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